



# 明代宫廷女教书的政治解析

谢贵安 谢 盛

**摘要:**在明代男权社会,由于存在“夫贵妻荣”和“母以子贵”的利益格局,后妃们常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不断卷入皇权主导的政治漩涡之中。她们以太后、皇后或贵妃的特殊身份,利用女性教科书编纂与讲授的机会,确立自己在宫中的导师身份、道统统绪和正统地位,以此衬托并维系丈夫或儿子在朝中的政治地位。明成祖仁孝徐皇后的《内训》、世宗章圣蒋太后的《女训》、神宗慈圣李太后的《女鉴》、神宗郑贵妃改纂的《闺范图说》,并非如表面所见的那样属于女子教科书,实际上却深蕴着政治斗争的意图。在认识到儒学对妇女的教化功能后,明代后妃们通过编纂宫廷女教书,占领儒学这一意识形态高地,用以维护其夫、其子所主导的上层建筑。明代女教书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儒学对妇女的渗透,亦反映了上层妇女对儒学的政治操弄。

**关键词:**宫廷妇女;教科书;道统;正统;政治意图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3-0068-08

教科书历来都是各方政治势力必争的意识形态阵地,其间充斥着太多的政治斗争。明代后妃亲自撰写的几部宫廷“女教”(即妇女教育)的教科书,不仅具有一般性的道德、品行、仪礼、容止等教育目的和文化意义,而且具有特殊的政治图谋。为了配合丈夫或儿子从事权力争夺,这些后妃亲自编改女教书,配合相当默契。对于明代后妃所撰宫廷女教书的政治意义,未见前人做过研究<sup>①</sup>,本文试作一探。

## 一、明代宫廷女教的内容与教材

“女教”也称“内教”,是古代用以指代妇女教育的概念。如成祖仁孝徐皇后在其《内训·原序》中称“独女教未有全书”;嘉靖间礼部官员尝言“欲令翰林院撮诸书关女教者,撰为诗言进呈”<sup>[1]721</sup>,皆使用这一概念。

宫廷女教制度在明朝业已成熟。据刘若愚

描述:“宫内教书,选二十四衙门多读书、善楷书、有德行、无势力者任之。三四员、五六员不拘……命一秉笔提督之。”<sup>[2]130</sup>指明了女教教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宦官。不过,早期宫中女教的教师由女官担任。如洪武初年的广东女子陈瑞贞“善书数,知文义,后宫多师事之,称女君子,亦曰女太史”<sup>[3]</sup>。范儒人给马皇后讲解过“黄老之学”。福建晋江人翁庆之女,曾被仁孝徐皇后召入宫中,成为“女师”<sup>②</sup>。

对于明代宫廷女教的内容与教材,刘若愚也作了说明:“所教宫女,读《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女训》、《女诫》、《内则》、《诗》、《大学》、《中庸》、《论语》等书。”<sup>[1]130</sup>上述教材中,有些是朝廷敕修,有些是后妃主持或亲自编纂。本文所说的后妃,包括太后、皇后、贵妃。

后妃所撰女教书,沈德符在《母后圣制》条中有概括:“本朝仁孝皇后著《内训》,又有《女诫》,至章圣皇太后,又有《女训》,今俱刻之内

收稿日期:2023-10-15

作者简介:谢贵安,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研究。谢盛,男,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205),主要从事明清史、近代史研究。

府，颁在宇内。今上圣母慈圣皇太后所撰述《女鉴》一书，尤为详明典要。主上亲洒宸翰序之，真宫闈中盛事也。”<sup>[4]71</sup>这里所说的仁孝皇后，是指成祖之妻徐皇后，章圣皇太后是世宗的生母蒋氏，慈圣皇太后是神宗的生母李氏。此外，还有另一位贵妃改编了教材《闺范图说》，她就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学者对后妃撰写女教书的原因，一般归结为文化背景，认为“在理学思想盛行、贞节观念强化、妇女教育得到重视的大背景下，明代女教书应运而生”<sup>[5]71</sup>。其实，明代后妃养尊处优，又处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本不用为写书而操心。事实上，明代十六个皇帝所拥有的众多后妃，绝大多数没有编写过教材，甚至未留下文字，那么上述四位后妃为何要费心劳力地编写女教之书？如果我们不进行政治背景的发掘，则很难理解其真正原因。

## 二、仁孝徐皇后撰《内训》以解“靖难”困境

明代由后妃亲自撰写的第一部女教书是成祖仁孝徐皇后的《内训》。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有关养德修身、谨言慎行、勤劳节俭、改过迁善、效法贤女，处理与父母、君主、舅姑、子女、外戚等关系，意在推广儒家伦理纲常的基本原则和礼仪规范的道德修养教材，其实，徐皇后撰写此书有着更为直接而深刻的意图，就是配合其丈夫成祖朱棣破解因“靖难”叛乱所造成的政治困境。有学者认为该书“最初不过是给皇太子看的”<sup>[5]72</sup>，似未领略成书的实际用意。

徐皇后乃中山王徐达的长女，自述“幼承父母之教，诵《诗》、《书》之典”<sup>[6]722</sup>。徐达对夫人称赞“此女天禀非常”，决定“以经史充其知识”，结果“后于书一览辄成诵不忘”，甚至“姆师咸惊异之”，“由是博通载籍”。她“每览昔人言之懿，未尝不一再以思”，感叹“古人书之册，固欲后来者仿而行之也”。太祖听说徐达有贤女，便向他为四子燕王求婚。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册她为燕王妃<sup>③</sup>。作为受过良好教育、有政治头脑的贤内助，徐氏积极配合丈夫从事“靖难”（实即篡位）后的舆论宣传工作。该书撰于永乐二年（1404年），可能徐皇后觉得尚不成熟，故“书成

未上”。永乐五年（1407年）她死后，皇太子将该书进呈，成祖“览之，怆然命刊印以赐”，显然领略到徐皇后撰写此书的真实用意，于是借机颁赐群臣：“（永乐五年十一月）乙丑，以仁孝皇后《内训》赐群臣，俾教于家。”<sup>④</sup>

《内训》是靖难之役后宣示成祖正统、消除叛乱困境的政治工具，理由如下。

第一，从作者来看，仁孝徐皇后是位有见识的女政治家，而非一般的后宫女性。她曾积极参与燕王的“靖难”：“上之国北平，后理内政，宫中肃然，而和厚逮下，有《周南·樛木》之德焉……上举义靖内难，后所赞画，多协上意。上帅师在外，留世子守国，敌兵攻城甚急，时城中守卒不支，凡部分措置，备御抚绥，激励之方，悉得其宜，城卒以全。虽事总于世子，亦多禀命于后云。”<sup>⑤</sup>因此，她在朱棣篡位后编纂《内训》，实具有为丈夫的政治困境解套的意图。据纪昀等指出：“《内训》一卷，明仁孝文皇后撰。案：成祖以篡逆取国，淫刑肆暴，无善可称，后乃特以贤著是书，凡二十篇。”<sup>[7]</sup>可见，《内训》不是一般的伦理教材，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第二，从写作时间来看，仁孝徐皇后撰述此书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和指向性的现实意义。《内训》前有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望日自序，说明此书撰于永乐二年，当时朱棣篡位伊始，全国臣民特别是京师（南京）市民，心向建文，对朱棣以武力夺权心存不满。仁孝徐皇后此时撰述此书，有为丈夫在宫廷内外特别是在妇女中收拢人心之用意。

第三，从主旨来看，徐皇后在《内训》中处处尊崇马皇后，其实是在表明自己才是马皇后衣钵的正宗传人，是后宫中的正统，与朱棣是太祖衣钵传人、为朝廷正统的舆论表里配合。徐皇后明确宣称，自己“事我孝慈高皇后，朝夕侍朝。高皇后教诸子妇，礼法惟谨。吾恭奉仪范，日聆教言，祇敬佩服，不敢有违”，于是以高皇后的“教训之言”为基础，撰述女教的教材：“仰惟我高皇后教训之言，卓越往昔，足以垂法万世。吾耳熟而心藏之，乃于永乐二年冬，用述高皇后之教以广之，为《内训》二十篇，以教宫壶。”<sup>[6]722</sup>徐皇后声称《内训》是对太祖高皇后教训之言的继承，意在宣示自己正位后宫的正统性，暗示自

己和燕王的“靖难”并非叛乱，他们入主京师是有所承受的。

这种由朱棣继承太祖，徐皇后继承马皇后的宣传口径，在朱棣改修的《太祖实录》和其子孙仁宗、宣宗主导编纂的《太宗实录》中，也有明显的反映<sup>⑥</sup>。《太宗实录》在徐皇后附传中大肆宣扬：“燕王妃恭勤妇道，高皇后深所爱重，尝曰：‘燕王妃所，行足以仪范宫闈。’又曰：‘此吾孝妇也！’”又声称徐皇后到藩国北平之后，“孝慈皇后崩，哀毁动左右。执丧三年，疏食如礼。免丧，或语及先后，未尝不流涕。”《太宗实录》还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靖难后朱棣专门问徐皇后：“犹忆先后遗言，何者其至要乎？”徐皇后便将马皇后的遗言之要点“历举以对”，朱棣听后甚喜<sup>⑦</sup>。这是在暗示徐皇后乃是马皇后的继承人。其实，朱元璋有二十多个儿子和众多儿媳，徐皇后能否受到马皇后的关注都很难说，但《太宗实录》却将徐皇后塑造成马皇后中意的儿媳，其实是在制造徐皇后得马皇后真传的舆论。

第四，从内容来看，《内训》多有劝天下妇女自我警惕、谨言慎行、安居乐业的内容，意图从家庭的另一半——女性的角度来安定局面，劝诫她们接受新的政权。如《勤励章第五》要求“农勤于耕，士勤于学，女勤于工”。《警戒章第七》要求妇女“念虑有常，动则无过；思患预防，所以远祸。不然，一息不戒，灾害攸萃，累德终身，悔何追矣”。《积善章第八》称：“我国家世积厚德，天命攸集。我太祖高皇帝顺天应人，除残削暴，救民水火；孝慈高皇后好生大德，助勤于内，故上天阴鹭，奄有天下，生民用义。天之阴鹭，不爽于德，昭若明鉴。夫享福禄之报者，由积善之庆。妇人内助于国家，岂可以不积善哉！”《事君章第十三》指出：“妇人之事君，比昵左右，难制而易惑，难抑而易骄。然则有道乎？曰：有。忠诚以为本，礼义以为防，勤俭以率下，慈和以处众。诵诗读书，不忘规谏，寝兴夙夜，惟职爱君。”又强调：“毋擅宠而怙恩，毋干政而挠法。擅宠则骄，怙恩则妒，干政则乖，挠法则乱。”还宣扬：“夫上下之分，尊卑之等也；夫妇之道，阴阳之义也。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之妻能推是道以事其君子，则家道鲜有不盛矣。”<sup>⑧</sup>这些内容的指向性很强，大抵是要求永乐朝的妇女

忠于新君，安于职事，和睦家庭，维护新的社会秩序。

可见，仁孝徐皇后的《内训》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意欲通过树立成祖继承太祖、自己继承高皇后的形象，为成祖朱棣“靖难”篡位后的政治困境解套。

### 三、章圣蒋太后撰《女训》以助“大礼议”之争

如果说仁孝徐皇后的《内训》旨在破解成祖的“靖难”困境，那么章圣蒋太后的女教书《女训》则是配合“大礼议”之争而作的政治宣示。

《女训》卷首有嘉靖九年（1530年）《御制女训序》、正德十五年（1520年）纯一道人撰序、同年章圣慈仁皇太后自序、嘉靖九年张皇后跋。全书一卷，分闺训、修德、受命、夫妇、孝舅姑、敬夫、爱妾、慈幼、妊子、教子、慎静、节俭等十二篇。高儒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成书的《百川书志》中著录该书：“凡十二篇，亦训宫壶闺闈之道也。”<sup>[8]</sup>此书当是正德十五年以前成书于兴王府，有当时安陆州玄庙观道士纯一道人所撰之序和蒋氏的自序为证。然而，此书的公布与传播却在嘉靖九年以后，其中的政治意图可以想见。

武宗死后，明廷面临最高权力的断层，于是决定迎立武宗堂弟、湖广安陆州的兴府世子朱厚熜为皇帝。然而，按照太祖父死无子则“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法，应该让朱厚熜过继给已故的孝宗为子，作为武宗之弟，再继承皇位。于是武宗母亲慈寿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临时决定让甫至北京的朱厚熜先“继嗣”再“继统”，这一决定引起了长达三年的“大礼议”之争。在张璁、桂萼、方献夫等议礼新贵们的鼎力相助下，朱厚熜终于获胜，不再称生父为“皇叔考”，而是堂堂正正地改称“皇考”，并且给父亲上谥曰“献皇帝”，上庙号为“睿宗”。然而，在后宫中，世宗生母章圣蒋太后蒋氏和世宗的后妃，仍不得不面临武宗母亲慈寿太后张氏和妻子孝静庄肃皇后夏氏势力的压力。为了在后宫扭转局面，蒋太后便利用公布和讲授女教书《女训》的机会，树立自己的权威。世宗自然极力推波助澜。

据《明史》载：武宗母亲慈寿皇太后“与大学

士杨廷和定策禁中，迎立世宗”，本来有功，但由于逼迫世宗“继嗣”，且对“外来户”世宗及其生母蒋太后轻慢，结果得罪了世宗母子。“初，兴国太后（即蒋太后）以藩妃入，太后犹以故事遇之，帝颇不悦。及帝朝太后，待之又倨。”这自然引起世宗不满，“事（慈寿太）后顾日益薄”。嘉靖元年（1522年）世宗大婚，初传慈寿太后的懿旨，但临时欲改用祖母寿安太皇太后的懿旨。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在生母“兴国太后诞节”时，“敕命妇朝贺，燕贻倍常”，但当慈寿太后生日时，世宗不顾众臣反对，“敕免贺”。世宗入继之初称慈寿为“圣母”，三年“改称伯母”。并借机逮捕了慈寿的两个弟弟，一个瘐死狱中，一个被处死。甚至当慈寿太后“衣敝襦席藁为请”时，世宗“亦不听”<sup>[9]3528-3529</sup>。在新旧宫中势力相角力的背景下，蒋太后意欲通过公布编写好的女教书《女训》来树立威信，宣传自己的正统地位，而世宗也十分配合母亲的行为，下令在宫中乃至全国推广。

既然《女训》在正德末年于湖北安陆州撰毕，那么为何嘉靖九年才予以公布？目的何在？原来，“大礼议”之争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世宗颁布《明伦大典》，“定义礼诸臣罪，追削杨廷和等籍”<sup>[9]222</sup>，才算落下帷幕。嘉靖九年颁布《女训》，有很强的宣示意味，表明无论是外廷还是内宫，世宗都获得了胜利。

嘉靖九年，世宗正式公布章圣蒋太后的《女训》，并让太后亲自面对后妃以下的宫中女性宣讲，要求自皇后以下的宫廷女性都予以配合：“九年，颁章圣太后《女训》天下，上命诵习自宫中始，翰林院更撰《内则新诗》，合歌二南以兴天下之妇教。是时，皇后日率妃、夫人听讲太后前。”<sup>[10]592</sup>

世宗对这次《女训》讲读活动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要求官员和诗庆贺。《女训》颁布后，士大夫们开始奉承，撰诗应和。廖道南撰《应制〈女训〉诗四章》，其一曰：“丕显成周盛，咸称太姒贤。忧勤能启祚，巽顺自承乾。赫赫先徽嗣，绵绵后叶传。关雎歌懿德，风化永昭宣。”<sup>[11]</sup>王教在章圣蒋太后《女训》颁布后，也应制和诗<sup>⑨</sup>。二是颁行天下，向全社会推行。三是“诵习自宫中始”，在宫中大肆举行活动，其针对武宗母亲慈寿张太后的目的十分

明显。

世宗极力推崇生母蒋太后女教书的目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确立章圣蒋太后的道统地位。为此，世宗下令制定了由蒋太后讲授其自编教材《女训》的仪式：“六日，皇后率妃、夫人诣圣母前听讲。”“授书行钦天监择吉，前一日，女官设圣母宝座于宫中，设授《女训》案于宝座傍。是日，女官侍卫如常仪。皇后具礼服，女官导诣圣母前四拜，女官赞授训举案，女官举授《女训》案于御座前，赞跪，皇后跪。赞恭听训命，赞兴，赞四拜。举案女官举案，皇后随案还宫。次日，圣后诣圣母前谢恩。”<sup>[1]721-722</sup>如此一来，蒋太后成了讲官，成为上自皇后，下至宫女的教师，确立了其在道统上的地位。正如胡凡所说：“章圣蒋太后俨然成了宫中后妃和女官们的教授，《女训》则成了后妃们必读的教科书，嘉靖帝刻意尊崇、抬高母亲地位的形象跃然纸上。”<sup>[12]</sup>

另一方面，确立章圣蒋太后的正统地位。世宗在将蒋太后的《女训》向全社会公布时，并不是单独发行，而是与《高皇后传》、徐皇后的《内训》一起颁示天下：“九年，以太后所著《女训》，与《高皇后传》、文皇后《内训》颁布天下，令翰林官撮诗书关内教者，撰为诗书，诵咏之宫中，而后四布中外，以兴天下之内教。”<sup>[10]615</sup>于是，章圣蒋太后与太祖高皇后、成祖徐皇后并驾齐驱，成为前二后的自然继承者，将一个来自藩府的王妃，塑造成拥有后宫中正统地位的神圣太后。

因此，这次《女训》讲读和推广活动，看起来只是宫廷后妃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一场鲜明的政治斗争。通过《女训》的学习，再次确立了世宗母子的正统地位。

对于世宗推行其母《女训》的用意，嘉靖时参加乡试的茅坤（1512—1601）十分清楚，在其策论《君后》中，列举皇家圣制时，特意提到章圣皇后的《内训》，指出：“及读我朝七圣以来，其所以听治于外而敷为王言之大者，则高祖有祖训焉，有教民榜焉，太宗有《五伦书》焉（按：《五伦书》实是宣宗纂），有《为善阴鹭》焉，有《孝顺事实》焉。皇上又有敬一之箴，五箴之注焉，所以章定保之谟，而体化召顺于上者，是固以备天下

之阳教矣。其所以听治于内而敷为母仪之训者,则高皇后有《女传》焉,仁孝皇后有《内训》焉,章圣皇后有《女训》十三章(按:当作十二章)焉,所以章幅帟之化,而迎气导和于下者,是固以明天下之妇顺矣,是故创业者弘燕翼之谋,守成者丕日清之典,宫戚无与政之嫌,嫔嫗无当夕之宠,天下之所以家传人诵,以歌舞于阴阳之理者,固与《卷阿》之美相比同矣。”<sup>[13]</sup>心领神会的茅坤从外廷皇帝“阳教”与内廷后妃“阴教”(即女教)两个角度,阐述了世宗继承太祖、成祖,蒋太后继承高皇后、徐皇后的正统性,可谓窥透了世宗推行章圣蒋太后所编《女训》书的深意。

#### 四、慈圣李太后编纂《女鉴》以追求正统

在明代宫廷亲自操刀撰写女教书的人中,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其夫穆宗死时,她不到三十岁,儿子神宗年方十岁,李太后移居乾清宫,与新首辅张居正合力教育皇帝。万历六年(1578年),神宗大婚,李太后不能再居乾清宫亲自管教皇帝,于是在返回慈宁宫前,嘱咐张居正:“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sup>[9]</sup><sup>3535</sup>把神宗的教育完全托付给了张居正,自己转而对神宗的后妃进行教导。

李太后的重要举措便是编纂女教书《女鉴》。在神宗御制序中有曰:“乃者大婚礼成,圣母谆谆谕朕,惟典学勤政,怠荒是惧;又念后妃内助,关君德匪轻,乃摭摭古传,择其善可法者四十人,恶可戒者十四人,辑为《女鉴》,略如辅臣所进《帝鉴图》意,亲序首简,授后妃使诵习焉。”<sup>[14]</sup><sup>437</sup>李太后此举是与辅臣张居正相配合:由张居正对皇帝进行教育,使用《帝鉴图说》等教材;而她自己则“念后妃内助,关君德匪轻”,对后妃们进行教育,以《女鉴》为教材,“授后妃使诵习”。这是李太后编撰《女鉴》的用意,也是该女教书产生的政治背景。

其实,除了教育神宗后妃的目的外,李太后编纂《女鉴》,还有另一层含义,便是追求自己的正统地位。她原为“都人”(宫女),出身卑微。神宗曾无意中触及李太后的敏感神经,说皇长

子朱常洛是“都人子”,结果“太后大怒”,指出:“尔亦都人子!”于是“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这是因为“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sup>[9]</sup><sup>3535</sup>。由于李太后的这种出身,所以她决定通过编写女教书,使自己成为道统上的导师,上承高皇后、徐皇后和章圣蒋太后。神宗也深知母亲的良苦用心,将《女鉴》置于明代历朝女教书的经典长廊,以此突出母亲李太后在后宫列圣中的正统地位,进而也强化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他在为慈圣李太后《女鉴》所作的《序》中称:“朕惟祖宗家法之善,超轶往古。高皇帝《宝训》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故自孝慈高皇后佐运开基,肇修《女诫》(按:《女诫》非高皇后所修,而是太祖诏修),嗣后有仁孝《内训》、章圣《女训》,嘉言懿行,载在皇史,垂法后裔,至章明也。”紧接着,便介绍其生母:“我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天授明德,克绍徽音,当先皇帝弃群臣,朕以冲年嗣位,未烛厥理,惟圣母皇太后保育教诲,俾予亲贤讲学,任人图治,以致太平,数年间,宫府一体,中外乂安,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又念后妃内助,关君德匪轻,乃摭摭古传……辑为《女鉴》。”<sup>[14]</sup><sup>437</sup>以此突出李太后接续后宫正统的统绪。

与世宗母子(蒋太后与世宗)双双关心各自在朝廷和后宫中的正统地位稍异,神宗母子并不担心神宗的正统地位,而更关心宫女出身的李太后自己的正统地位,故《女鉴》之作,无疑是为了显示李太后在道统中的导师身份,从而确立其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子以母贵,这样做无疑也会使神宗的地位更加稳固,因此获得其大力推介。

#### 五、郑贵妃改《闺范图说》以图废长立幼

与仁孝徐皇后、章圣蒋太后和慈圣李太后力争正统的目的大致相似,神宗郑贵妃改编女教书《闺范图说》的政治企图也在于树立自己上承统绪的形象,为废长立幼开展舆论宣传。

神宗的皇长子是王恭妃所生的朱常洛,而郑贵妃之子朱常洵则排位在后,按照“立长不立

幼”的传统,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然而,郑贵妃并不甘心,希望神宗能够弃长立幼,将朱常洵立为太子。为此,她孤注一掷,抛出了经过修改的吕坤《闺范图说》作为女教书。

郑贵妃未如前面三位后妃一样亲编教材,而是选定了吕坤的《闺范图说》作为女教书,并稍加修改,使之成为自己废长立幼的舆论工具。《闺范图说》是神宗派司礼监臣及乾清宫管事牌子“各于坊间寻买新书”时所得。太监陈矩对“所进之书,必册册过眼”,其中就见到过《闺范图说》。“神庙曾将《闺范图说》一部赐郑贵妃,于万历乙未(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秋贵妃捐资重刊。”<sup>[21]</sup>郑贵妃利用神宗赐给自己的《闺范图说》在重刊时加以修改,新增了十七个当朝的顺天府节烈妇女传记。吕坤称新刊之书“附以顺天节烈妇十七人”,“而此十七人多万历时人,且多贵势家”<sup>[15]82-83</sup>,与原著不同。那么郑贵妃为何要新增当朝节烈之妇的传记?其用意是让人们注意到它的现实意义。

郑贵妃修改《闺范图说》的意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在序中塑造自己上承徐皇后和章圣蒋太后统绪的形象,为自己进位皇后进而立己子为太子制造舆论。

郑贵妃在重刊《闺范图说》时亲撰一《序》,以后宫导师的身份和口吻,指出“闺门者,万化之原,自古圣帝明王咸慎重之”,因此自己“尤思正己宜正人,治家宜治国”,想“求其明白简易,足为民法”的一部闺范教材推广,“近得吕氏坤《闺范》一书。是书也……真闺壶之箴鉴也”,她特别强调:“然虽不敢上拟仁孝之《女诫》,章圣之《女训》,借令继是编而并传,亦庶乎继述之一事也。”<sup>[2]3-4</sup>尽管郑贵妃说自己不敢上拟徐皇后、蒋太后的女教书,实际上却提醒人们她就是二位后妃的继承者。对于郑贵妃此序包藏的用心,当时便有人指出,她在《序》中“引先朝《女诫》、《女训》,彼乃母后临子,儒臣纂编,兹相比拟,得毋不伦”<sup>[2]4</sup>?仁孝徐皇后和章圣蒋太后的儿子都做了皇帝,郑贵妃以己比二位后妃,其企图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郑贵妃在《序》中历举当朝女教书时,只字未提其婆婆李太后的《女鉴》,这并非一时疏忽,而是故意排除李太后

在此统绪中的地位。这是因为李太后正是郑贵妃废长立幼的障碍。神宗曾向李太后抱怨皇长子朱常洛是“都人”(宫女)之子,身份太贱,不宜立为太子,无意间触犯了同为宫女出身的李太后的禁忌,遭其痛斥,废长立幼的企图被迫搁置。由于郑贵妃与李太后严重对立,郑贵妃在《闺范图说》的《序》中缕述后妃编纂女教书的统绪时,便有意剔除李太后的《女鉴》。即使神宗在将《闺范图说》送给郑贵妃时,特地提到该书与其生母李太后的《女鉴》相似:“《闺范图说》是朕付与皇贵妃所看,朕因见其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词旨仿佛,以备朝夕览阅。”<sup>[2]7</sup>郑贵妃却依然在重刊《序》中对李太后的《女鉴》只字不提,其对李太后的反感之心由此可见。

第二,突出“子以母贵”的观念,为郑贵妃之子立为太子制造舆论。

《闺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马皇后,马后由贵人进位中宫。郑贵妃重刊此书,意图为自己进位皇后,进而为自己的儿子夺得太子之位制造舆论。该书重刊后,当即便有人作了分析:“古今贤贵妃多矣,胡《图说》独取汉明德一后?明德贤行多矣,胡《图说》首载由贵人进位中宫?”攻击吕坤当“大内被灾,中宫减膳,以妃进后,事机将成”时,“乘此时进,亦值其会”,并声称“当世名人若张公养蒙、刘公道亨、魏公允贞、郑公承恩、邓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绍、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称吕所见极高,所举极当,咸举春秋大义子以母贵之说,共建社稷奇勋”<sup>[2]4-5</sup>。

郑贵妃试图以改修和重刊《闺范图说》,来制造弃长立幼的舆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却引起了强烈的抗争。万历二十三年重刊此书,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科臣戴士衡便撰《闰鉴图说跋》一篇,标曰“忧危竝议”,指斥吕坤假托此书包藏祸心,是帮助郑贵妃将其与成祖仁孝徐皇后的《内训》、世宗母章圣蒋太后的《女训》相提并论,以正统后妃自居,目的是想通过子以母贵,来为郑氏立己子朱常洵为太子制造舆论。虽然神宗将戴士衡薄惩示戒,但是一位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又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实为化名,意思是朱家东宫太子大吉。此文采用问答体形式,通过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郑贵

妃废长立幼：“东吉得《闰鉴图说》，读之，叹曰：吕先生为此书也，虽无易储之谋，不幸有其迹矣。”<sup>[2]4</sup>见形势不妙，郑贵妃伯父郑承恩（亦称郑戚畹）不得不于万历二十六年仲夏出面解释，撰写《辨冤续言序》以表明郑贵妃并未想利用《闰鉴图说》来达到废长立幼、“易储谋逆”的目的，科臣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对贵妃的攻击，是“病狂丧心”“利令智昏”<sup>[2]2</sup>。

该案中的主要当事人吕坤，不得不多次上疏表明心迹并作辩解。其《辩明心迹疏》言明：他最初撰刻《闰范图说》四册，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与郑贵妃重刻《闰范图说》时间相隔较远，且当时在外做按察使，与郑承恩和贵妃并无来往，因此不可能借撰此书而包藏祸心<sup>⑧</sup>。但是辩解并未奏效，不久有人又传播《忧危竝议》一书，对他进行攻击，于是吕坤不得已再次上《辩忧危竝议疏》进行申辩：“明德马后，汉明帝之元配也。汉法：册后不自民间，先选良家子以充后庭，如八子、七子、夫人、贵人、姪娥、容华之类，值册立时，则选众所推服者一人为后，马明德册自贵人，《汉书》所载也。自有《汉书》以来，凡《女训》诸书，莫不录其为人，莫不具其发迹。”<sup>[15]81</sup>极力澄清其为郑贵妃张目之事。

由于受到极大的舆论压力，郑承恩不得不再次出面撇清郑家与谋立太子的关系，要求皇上“早建皇长子东宫，速举冠昏之典”<sup>[2]7</sup>。这场由郑贵妃刻吕坤《闰范图说》引起的巨大风波，意外地加快了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的进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神宗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六子朱常润为惠王、七子朱常瀛为桂王。此后沈德符读到的《闰范图说》，已被改名为《闰鉴图说》，而“《图说》第一段，明德马后居首者，今已删去不存”<sup>[4]875</sup>，说明此事已成为敏感问题而被回避。一部《闰范图说》教育课本，被卷入声势浩大、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中，的确超出了作者吕坤的意料。郑贵妃重刊《闰范图说》意图明确，然而她的支持者神宗却是一个庸懒懦弱的君主，无法给予坚定的支持，导致郑贵妃集团很快便由于缺乏正统性而落败。士大夫借机将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并迫使福王朱常洵就藩之国。郑贵妃此举可谓得不偿失。

## 结 语

教科书历来都是各政治势力必争的意识形态阵地，由后妃所撰的宫廷女教书亦不例外。从表面上看，明代宫廷女教书皆包含一般性的道德、品行、仪礼、容止等教育目的和文化意义，但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进行细致分析，则可以看出这些女教书背后所蕴含的政治企图。

前文所述四部宫廷女教书，皆与明朝不同时期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成祖仁孝徐皇后的《内训》，为明代后妃亲撰的第一部女教书，在推广儒家伦理纲常的基本原则和礼仪规范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亦配合丈夫成祖朱棣破解因“靖难”叛乱所造成的政治困境。章圣蒋太后的《女训》，成书于正德十五年以前的湖北兴王府，直到嘉靖九年世宗稳坐江山后得以刊布和传播，此时距世宗颁布《明伦大典》，宣示“大礼议”之争彻底落下帷幕才仅仅过去了两年，该书的及时刊布，无疑确立了章圣蒋太后正统和道统的地位，亦从侧面再次强调了世宗“大礼议”之争的胜利。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所编《女鉴》，撰于万历六年神宗大婚之后，是为配合其政治盟友张居正所撰《帝鉴图说》而作，后者为教育皇帝而编写，前者将历代贤良后妃和作恶后妃的史事纂集成历史读物，并加上劝诫之言和道德说教，专为规训神宗后妃而撰。神宗郑贵妃改编的女教书《闰范图说》亦暗藏玄机，其在该书序中历举当朝女教书时，只字未提其婆婆李太后的《女鉴》，故意将反对废长立幼的李太后排除在外。同时，郑贵妃在该书中塑造其上承徐皇后和章圣蒋太后统绪的形象，并强调“子以母贵”的观念，为自己进位皇后进而立己子为太子制造舆论。

总之，在古代男权社会，后妃们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不断地卷进男性主导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她们以特殊的身份在特殊的战场来捍卫自己丈夫或儿子的地位与权力。明代的太后、皇后和贵妃们，积极利用编写和讲授女教书的机会，确立自己在宫中的导师身份和正统地位，以此衬托并维系丈夫或儿子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上述后妃通过编纂宫廷女教书，急欲

占领儒学这一意识形态高地,用以维护其夫、其子所主导的上层建筑。明代女教书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儒学对妇女的渗透,亦反映了上层妇女对儒学的政治操弄。

#### 注释

①对明代宫廷妇女教育进行研究的成果有丁伟忠:《明代的妇女教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3期;蔡锋:《对古代皇宫贵族女性文化教育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3期;陈宝良:《明代的妇女教育及其转向》,《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6期;李庆勇:《明代女教书著述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吴仕伟:《明代宫廷教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但这些研究成果均未对后妃所撰的女教书的政治意义予以剖析。②谈迁:《枣林杂俎》义集《彤管·翁氏女女师》,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4页。③④⑤⑦胡广等:《明太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966—967页,第1016页,第967页,第968页。⑥谢贵安:《明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363—364页。⑧明仁孝文皇后:《内训》之《勤励章第五》《警戒章第七》《积善章第八》《事君章第十三》,见《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77—478页。⑨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九《中川王亚卿传》,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⑩吕坤:《去伪斋文集》卷二《辩明心迹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9—80页。

#### 参考文献

- [1]郭正域.皇明典礼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 [2]刘若愚.酌中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 [3]欧初,王贵忱.屈大均全集: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06.
-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李庆勇.明代女教书著述研究[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71-73.
- [6]仁孝徐皇后.内训:原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7]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789.
- [8]高儒.百川书志[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7.
- [9]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何乔远.名山藏[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11]廖道南.楚纪[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514.
- [12]胡凡.明世宗与宫中太后及皇后关系述略[M]//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169.
- [13]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76.
- [14]黄洪宪.碧山学士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15]吕坤.去伪斋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A Political Analysis on the Court Women Textbooks in Ming Dynasty

### Xie Gui'an and Xie Sheng

**Abstract:** In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 of the Mi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interest pattern of “husband noble and wife honor” and “son noble and mother honor”, the imperial concubines were often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whirlpool dominated by the imperial power as wives and mothers. As the special status of empress dowager, empress and imperial concubine, they made use of the opportunity of compiling and teaching female textbooks to establish their status of tutor and orthodoxy in the palace, foil and maintain the husband or son in the political status. *Inner Discipline* of Chengzu's empress Renxiaowen, Sejong the Great Chang's *Female discipline*, Sinjong chi-sheng's *Female reference* and Sinjong Cheng's *Boudoir style*, i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women's textbook as it appears, but in fact it contains the intention of political struggle. Recognising the role of Confucianism in disciplining women, the imperial concubines of the Ming dynasty occupied the ideological high ground of Confucianism by compiling court women's textbooks to defend the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dominated by their husbands and sons. The appearance of female teaching in Ming dynasty reflected not only the infiltration of Confucianism to women, but also the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f Confucianism by upper-class women.

**Key words:** court women; textbooks; Confucian orthodoxy; orthodoxy; political intent

[责任编辑/周舟]